

從虔誠的朝聖者到批判的勇士——

論顧準的思想成因及轉變

◎ 周鐵水

顧準無疑是上個世紀末期中國知識份子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如有的學者評價的那樣：「他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他那科學系統，犀利冷靜，永不妥協的批判精神，今天仍具有不可思議的超前性和理性上的認知價值。

追思他的一生，我們驚奇地發現顧準是如何從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充滿批判精神的真正本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覺完成這個過程是艱難的，但他痛苦地做到了。

顧準生於1915年，四年後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五四」運動，當時中國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關頭。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但接踵而來的是軍閥混戰。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的現實，不但使「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光復中華」的理想幻滅，而且促使許許多多的仁人志士去認真思考魯迅先生當時提出的「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這樣一個重大的社會現實。

更迭的政權，動盪的時局，客觀上形成了自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以來，中國第二次思想自由的大解放，成就了日後中國現代文學史、藝術史、哲學史、思想史等領域的許多巨匠和大師，同時也造就了中國現代革命史上蔚為大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和功勳彪炳的將星雲集。這當然不是說，那時就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1927年軍閥張作霖就殘暴地殺害了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李大釗，只不過連年的軍閥戰爭，使「城頭不斷變幻大王旗」，暫時無暇顧及對思想和言論的鉗制。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巴黎和會」上對戰勝國之一中國的瓜分，消息傳來，激起中國知識界特別是學生的強烈憤慨，以北大為代表的學生首先發起抗議示威活動，隨後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愛國民主運動。

有一種觀點認為「五四」運動的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旗幟也應該是愛國主義，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如果接受這種觀點，「五四」運動和先前林則徐的禁煙運動、義和團運動和在後的抗日救亡運動就沒有多少區分了，甚至和古代歷史上抗擊外族的鬥爭也沒有多大的區別，毫無疑問，愛國是「五四」運動的重要內容，但愛國主義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更不可能成為「五四」運動的精神旗幟。

「五四」運動的核心和精神旗幟是自由和民主。作為一場自發的政治文化運動，實際上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而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在政治上反對封建專制，要求自由民主；在思想上反對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要求個性解放；在學術上反對迷信盲從、偶像崇拜，提倡科學精神；在文化上反對文言文、八古文，提倡白話文和文學革命。很顯然，這些內容實質上無一不是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只不過表現形式不同。

深刻了解這段歷史和當時的社會環境非常重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背景對顧準今後思想的形成和以後思想的轉變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史上愛國主義運動的先河，1925年顧準親歷了「五卅」運動，這是上海人民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首次明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平等權利的革命運動。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激發了顧準幼小心靈中的愛國主義熱情，他和小夥伴們一齊用具體行動來支持「三罷」運動（罷工、罷市、罷課）和抵制外貨的運動，他們打著旗幟，拿著竹筒，走街串巷為罷工的工人募捐。此時顧準才十歲。

1926年十一歲的顧準有幸就讀由中國著名職業教育家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學校以「勞工神聖，雙手萬能」為口號，教師並且經常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介紹帝國主義依靠租界特權，胡作非為，以及不平等條約帶給我同胞的種種災難等。青年學生經過這些教育，無不引為奇恥大辱，奮發圖強，愛國之情油然而生¹。同時在那裏顧準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打下了堅實的英語基礎。

1927年夏天，因為家庭無力繼續負擔學費，顧準在中華職校畢業後，經人介紹進入由潘序倫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直至1940年顧準參加新四軍，在這漫長的十四個年頭中，除少數時間外，顧準一直在立信工作，並與潘序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聰明好學，勤奮努力，很快就掌握了會計學科這門知識，並攀上了學術高峰。再加上潘序倫唯才是舉，並不囿於世俗的偏見，拘泥甚麼學歷、年齡等條件，對顧準大膽提拔，委以重任。從一個練習生，顧準很快成長為一個會計學者、作家、教授，成為立信的台柱之一。並以此為職業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可以這麼說當時顧準的生活條件是比較優渥的，但為甚麼會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他的胞弟陳敏之有一段平實中肯的論述²：

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繼發生，當時國民黨政府採取的民族投降主義，對日屈膝妥協，對內矢志剿共，震撼全國；亡國的現實危險，喚醒一代青年的民族覺悟。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有效途徑，顧準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且採取實際行動，從組織馬克思主義秘密小組——進社，到投身到革命的行列，成為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是一個會計學家，但同時又是一個共產黨人。他的人生目的是實現革命理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顧準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顧準擅長文字工作，參加革命後筆耕不輟，曾用化名，結合自己的職業，對當時的形勢撰寫了不少頗有創見和有影響的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上海職業運動的方針政策。如1939年發表在《職業生活》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上的《上海職員與職業運動》一文，長達近萬字，以大量客觀的材料，詳細地分析了上海職員的現狀和開展職業運動的積極意義。

使人感興趣的是，1926年毛澤東曾經寫了一篇經典性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

宗明義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對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毛澤東把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明確劃分為：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通過分析各階級的經濟狀況以及由此而決定的政治立場和對革命的態度。他在半無產階級中是這樣分析店員的，「店員是商店的雇員，以微薄的薪資，供家庭的費用，物價年年增長，薪給往往須數年一增，偶與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貧農及小手工業者不相上下，對於革命宣傳極易接受。」毛澤東最後總結出：「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從而實際上發表了中國革命的綱領。

事隔十三年後，顧準在《上海職員與職業運動》一文中，同樣採用階級的分析方法，詳細論述了不同階層職員的經濟狀況以及政治立場和對革命的態度。

他認為當時上海的職員大致可以分為這麼三種：舊式商店的職員（日常供給消費品的小商店）、外國洋行、外商企業的職員和在民族工廠的職員。

除了少數高級職員外，對於廣大下層職員，顧準是這樣論述的：「他們大部分收入很低，家庭負擔很重，於是這個月的收入，上個月已經花完。每到發薪這一天，買東西所餘的賬，零星的借款一還，薪水已經完了，下個月開始，重新再借債過日子。」³因此，顧準得出的結論是，「從社會地位與職工福利的觀點上講，工人與職員是絕不能劃分出來的，他們結果會屬於同一階級，也應該屬於同一階級，雖然工人是直接的價值生產者，而職員除少數高級職員如經理、工程師參加分配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外，普通一般職員，或者為附屬生產過程中價值的生產者，或者為商業資本家保障分取剩餘價值。因此，職員的勞動也是我們這社會的經濟構造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是被剝削者。這就是我們在研究上海職員以前，所應該首先做出的結論：『職員與工人階級是不可分離的，職員是工人階級的兄弟』」。根據這樣的結論顧準指出：「在上海職員中他們所佔的比例是如此的大，就使他們不得不成為職員救亡運動的中堅力其量，因為如果舊式店員站在職員救亡運動之外，職員運動就不得不成為殘缺不全，充量只有一半作用的東西了。」⁴

我們可以看出，顧準完全是用馬克思《資本論》中「剩餘價值」的觀點來分析的。比較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和風格，那時顧準的思想認識是完全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保持一致的。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顧準始終都是一個忠實而又虔誠的布爾什維克。

二

1949年，無論是對中國歷史抑或是對顧準本人，都是非同尋常的轉折之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鬥，終於建立了人民共和國。1931年就投身革命的顧準，如今即將成為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財稅行政長官——上海市財政局、稅務局局長。他雖然精通經濟，但不善辨別政治風向，等待他的除了紅地毯，更多的將是荊棘。據時任中共上海

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陳修良的回憶⁵：

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出了顧準駭人聽聞的錯誤：目無組織，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這是怎麼回事？問題出在徵稅的方法問題上。

按照某些領導同志的意見，徵稅應實行納稅戶「自報公議、民主評議」的方法。但顧準觀點不同，他認為上海不同於小城市，不能純靠納稅戶民主評議；上海大部分工商業戶都有賬冊可查，應當依法交稅，其他分散的個體戶可以定期定額納稅，即所謂「依率稽徵，專管查賬，職工協稅」。顧準的意見即得到陳毅市長首肯，1951年陳雲同志也曾曾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表過態：「顧準對稅收方法的意見是對的」。但到了1952年2月，卻裁定顧準堅持的稅收方法是違法亂紀，顧準於是成為「三反運動」中的反面典型，「尚方寶劍」落到了這位無辜者的脖子上。

退一萬步，即使顧準的觀點不盡合理，但他與領導之間的爭論也只限於方法；他雖善於獨立思考，也許確也有點驕傲自大的表現，然而以之「上綱」為「反黨」，確實匪夷所思。其實，顧準當年在財經工作上的觀點就是到了今天，還能令我們嘆服他的預見性。例如1952年「三反」前，他曾堅決反對機關生產。他認為，在解放區的機關生產是自力更生，限於農業生產，目的是改善機關工作人員極其艱苦的生活，自食其力，不是剝削。但是，「工商業範圍內的機關生產單位不帶上濃厚的資本主義氣味是不可能的，建議市委不要搞……」這個意見被市委採納，並向中央彙報，毛澤東對此也表示：「從此機關生產名譽掃地了。」

顧準的觀點正確與否，歷史自可做出公斷，但在1952年2月，他卻只能被撤職，調離上海，並背上了無法甩脫的包袱。

顧準主張依照稅法所規定的稅率「查賬徵收」，並下大力氣建立了劃區分片的稅務專管制度（一直在全國範圍內沿用至今），這種「依法」還是「不依法」的爭論，以顧準的去職而告終，這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在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一種陋習：長官意志決定一切。事實上，按照顧準的方法，1952年3月，上海入庫的稅收達三億萬人民幣（舊制），較1950年增加十倍。這難道是長官意志可以辦到的嗎？

明明是對的，確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並逐漸被視為「異類」。但當時的顧準也並未對為甚麼會出現這種不容「不同想法」的做法，有更多的思索，新中國建設的熱潮正鼓舞著每一個人的精神。此後，顧準曾被派去協助一些國家重點工程的建設工作，但從此他再也沒有擔任過有職權的領導崗位。

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裏來，只能從實踐中來。（毛澤東語）長期的革命經歷和工作實踐，使他敏感的心中有了太多的疑惑，顧準認為那是因為他的馬列主義的政治素養還不高，對世界認知的知識還不夠。1955年9月，根據本人的要求，顧準開始了在中共中央黨校為期一年的學習生活。這段時期正是被人們稱為，「中央黨校的黃金時代」。他在《黨校日記》（1955年11月25日）曾興奮地寫道⁶：

新的課程開始三天了。兩方面的感受。第一，政治經濟學的學習，我原計劃一定要讀完《資本論》的，看來時間不多，有些困難，但一定要做好安排，一定要完成計劃。特別是關於再生產理論和地租論，貨幣論，要為我解決一批問題。這應做，連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書籍，大約有三千頁至三千五百頁，其中小部分要做摘錄。其次是蘇共黨史

的學習，連同《共產黨宣言》、《列寧文選》第一卷的大部分，《斯大林全集》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許多材料，大約也有三千頁以上的東西要讀。時間是到明年四月上旬為止。這樣幹，頗有拼命主義之慨，但我想緊張一些，還是能完成任務的。

自1940年以來，長期間沒有進行這樣的學習了。而回憶1940年以前的學習，也實在可憐。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史是不了解的，從培根以來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臘羅馬是毫無所知，這就是缺乏重要的歷史知識的基礎。思想方面，既不知邏輯是甚麼，也不知道甚麼是唯物主義，甚麼是唯心主義。了解（的）一些甚麼，是報章雜誌之學加上直觀、臆想，全部知識水準，其實是停留在clerk（普通辦事員）的水準上，而我的全部思想，把片言斷語的馬列主義知識拿掉，剩下來的不是這個（樣）又是甚麼呢？目前面對著系統的學習，開始使我看清楚自己的面貌，這倒實在十分有用的。

這樣說來，目前的學習是過去從來不曾有過的，是一種全新的學習。

黨校的學習環境，使顧準得風氣之先，他廣泛涉獵，獨立思考，通過大量閱讀馬列經典著作，研究各國歷史，終於學貫中西成為大家。顧準的可貴之處在於並不迷信書本，崇拜經典，而是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開始了孤獨漫長而又堅苦卓絕的思想之旅。

三

「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運動，它不僅第一次向具有幾千年封建傳統的中國廣泛傳播了自由民主的科學精神，同時也促進了西方各種新思潮的大量出現。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從一種思潮成為一種行動思想。1927年蔣介石反動派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對革命工農群眾進行了大屠殺，血的教訓不僅粉碎了一些人走議會道路和民主選舉建國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促使共產黨人明白了這樣一個真理：槍桿子裏出政權。從而拉開了「用革命的武裝去反對反革命武裝」的波瀾壯闊的暴力革命和救亡運動的序幕。這不是「五四」運動的必然結果，但確是當時中國命運的必然選擇。

暴力革命對歷史的推動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暴力革命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第一，它不是萬能的，它只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產物，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第二，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會造成大量的死亡和對社會秩序的破壞。第三，暴力革命不能代替民主和科學精神的生成與培養。在好的情況下，革命能為民主和科學的成長開闢道路；如果被濫用就有可能抑制民主和科學的成長。

救亡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甚至要超過暴力革命，救亡運動對於一個要自立於世界的民族來說，是絕對必要，絕對不容褻瀆的。但救亡運動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如在救亡的同時容易滋長盲目排外和民族狹隘情緒，在反對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的同時，將西方一些可借鑒的民主和科學的東西一齊反掉。歷史的教訓是：暴力革命和救亡運動的成功雖然能恢復民族的獨立和尊嚴，卻不能自動帶來民主和科學的發展，反而可能出現獨立後的政治權力壓制民主和科學精神成長的情況。實際上就是要解決如何完成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重新認識。

對於今天這種評價，50年代的顧準開始也並沒有深刻地意識到。

一年的黨校生活很快就結束了，他來到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來到所裏後，顧準結合自己前一階段參加經濟建設中所發現的問題，認真思考，撰寫了大量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指導意義的經濟論文，為了不讓它們泯滅，有必要重提這些文獻中一些著名的

篇章：《學習毛澤東同志「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中經濟部分的幾點體會》（1956年）、《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1956年）、《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1957年）。這些論文的字裏行間無不閃爍著顧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深刻理解，並且對斯大林模式的計劃經濟提出了大膽的質疑。對此，稱「顧準是我的老師和摯友」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後來是這樣回憶的⁷：

顧準1956年和1962年兩次進經濟研究所……顧準第一次來所，是在建築工程部洛陽工程局和部財務司擔任幾年行政領導工作以後，想退出實際工作，冷靜地思考一些問題，就趁當時「充實文教戰線」的機會，調到經濟所做研究工作。初來的時候，擔任我所在的財政組的組長，所以是我的直接領導。但他並不管組裏的行政事物，從早到晚都鑽在經濟所圖書館的書庫裏讀書。他留下的經濟文章都是那個時期寫的。當時，他已經意識到計劃經濟體制全面建立以後有甚麼事情不對勁了，因此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這篇論文裏，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觀點。他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幫」以前，雖然曾經有一批經濟學家提出過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各企業之間交換的產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卓炯）等突破性的觀點，但是沒有一個人達到了顧準那樣的水準。甚至像孫冶方這樣傑出的經濟學家，雖然提出了「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的口號。但他還是再三說明，自己所講的「價值規律」是「第二號價值規律」，而不是聽任價格自發漲落，即真正的市場規律來調節生產。所以，顧準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我當時研究的課題是企業改革。我的思想還停留在「利用價值規律、加強經濟核算」的水準，所以可以說對顧準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

這在解放初期「一切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政治環境下，是需要多麼大的政治勇氣和嚴謹的科學精神。但如果顧準的思想僅僅只是停留在對我國經濟體制的思考和探索的層面上，那他也許只是一名傑出的經濟學家。

四

思想是危險的，鋒利就更危險，特別是對思想者本身。顧準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一些不同看法，早就招引了某些人的不滿，只是礙於顧準當時的身份和解放初期比較寬鬆的政治氛圍，暫時相安無事。

1957年顧準等人和蘇聯科學院生產力配置委員會聯合對黑龍江流域進行綜合考察，就是這次考察為顧準打開了地獄之門。據吳敬璉回憶⁸：

在黑龍江考察期間，幾位蘇方人員態度相當蠻橫，凡是開發的好處都想留給蘇方，而造成的損失都讓中方承擔。顧準看不慣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採取了針鋒相對、據理力爭的態度。考察組有的中方領導成員認為，對「老大哥」應當恭敬從命，就把顧準的有關言行記錄下來，報到北京去，正趕上「反右派」，由於顧準的這些言行違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中的第六條：「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時也因為「嚴重右傾」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顧準的具體過程，只知道在科學院範圍內印發了輯錄他的「反黨言行」的專題材料（他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作用的言論也被輯錄進去了），開過好幾次批判會，然後正式戴上「右派」帽

子。

顧準被劃為右派分子後，被迫下鄉勞動。1958年5月上旬，來到河北贊皇縣接受監督勞動。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又隨中科院部分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商城縣勞動改造。在這裏他親眼目睹、親身體驗了「大躍進」帶來的惡果。在《商城日記》中，他陸續記下了當時的慘景：

昨晚，附近路倒屍二起，一起由綜合隊埋了，一起由何祥福、徐雲周、老鄧負責埋了。八組黃渤家中，老婆、父親、哥哥、二個小孩，在一個半月內相繼死亡。這個家庭也特別大，未死人前連黃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個，則死亡比例也不算小了。一家連死幾人之例，已聽到的有：柳學冠，母親和弟弟。張保修，哥哥和嫂子。黃渤，則上舉五人即是。⁹

挑磚、擔糞、種地等繁重的懲罰性勞動使他變得「我的容顏憔悴之至。鏡內自望，都不認識了。」同時精神上的折磨也使他常常處在自責中，「我是否變得卑鄙了？我偷吃東西，我偷東西吃。」但嚴酷的環境反而也使他清醒地認識道¹⁰：

而所謂右派分子的摘帽子，無非是一種政治上的勒索。北京宣布140餘人，都是為了照顧政治影響，潘光旦、浦熙修之類都是。對廣大的右派分子，他是絕不放心的。而局勢愈緊張，防範愈嚴。所以我的改造表現再好，不過求苟全性命而已。甚麼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環境，都是采秀（注：顧準夫人）式的空想。不見此間摘帽的人依然在勞動隊不往外放嗎？

殘酷的現實促使顧準的思考從過去僅從經濟的角度看問題的羈絆中解脫出來，開始前所未有的大範圍、大視野，溯本尋源的反思。「娜拉出走後怎麼辦？」這個沉重的話語，以後象魔咒一樣在他的著作中反復出現，從此顧準踏上了一個孤獨的思想者在煉獄中艱難跋涉的不歸路。

五

人生的道路怎麼會這樣痛苦難行——貧困、饑餓、疾病、孤獨、誣陷、歧視，苦役般的勞作，無休無止的批鬥和檢討。生存只是為了真理，對於他，晝夜是沒有區別的，苟延中悄悄從書本上吞啞人類的文明，反芻苦難，用筆默默記錄精神的潛行。

此後顧準多次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期間雖曾摘過「右派」帽子，但「四清」運動中又被戴上，直至1972年才從農村回到北京。在這漫長的折磨中，妻子自殺，兒女離他遠去，老母近在咫尺，卻不許相見。顧準像歷史上的先賢一樣，雖然心在淌血，卻「雖九死而不悔」，他在日記中寫道：「會計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舊業，也不想再操了。」他要繼續那雄心勃勃、涵蓋中外的龐大研究計劃，想要通過徹底研究東西方的歷史，從整個世界文明史發展的角度來審視近百年來在中國發生的這一切。來告訴國人和回答自己心中多年的迷惑：為之奮鬥一生的革命，勝利後究竟應該是一個甚麼樣的社會。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顧準一直用最擅長的經濟學的刀法解剖社會，當他了解到資本主義並非純粹的經濟現象，而同時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時，便努力向歷史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作如饑似渴的求索。對於他，任何工作、任何科學知識、任何文字都在奔赴同一個目標。早在

1969年在河南農村的時候，他已經痰中帶血。回到北京後，病況加劇，可是他索性以北京圖書館為家，爭分奪秒地查找資料，做卡片，寫筆記，終於成就了《希臘城邦制度》等數十萬言的論著。這部言必稱希臘的著作，其實所言並非希臘，正如書中言不及中國，其實字字所言皆中國。這部連西歐史專家也對它的科學價值讚歎不已的巨著，（吳敬璉語）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深刻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截然不同的區別，目的是：一、徹底讀懂馬克思主義，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義。二、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淵源。三、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

顧準坦露自己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拿西方文明為標準，評判中國的現實。這備受攻訐的「全盤西化」論無非表明：只有借助異域文明，才能打破固有的深具整合能力故而滯重無比的傳統結構，從而與進步人類相溝通。歷史與未來成了現實的兩大參照：歷史提供了方法論，未來提供了價值觀。

顧準的思想發出最燦爛的光芒，是1973年至1974年間應胞弟陳敏之的要求，用通信方式寫下的大量筆記形式的學術論文，後結集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陳敏之在序中寫道：「1973年至1974年，正是我國當代歷史上黑暗的年代，歷史正在滑坡，一時還望不見谷底。人民群眾只能在私下為國家的命運憂心忡忡。然而，作者卻以冷峻的眼光、誠實的態度對當代歷史作著新的探索。『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顧準語），這就是作者進行歷史探索和寫作這些筆記的主旨。」¹¹

從書中，可以看出顧準已經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即「五四」運動後，為了推翻反動階級，為了實現理想可以採取狂飆式的暴力革命，但革命勝利以後必須實現多元主義、經驗主義（借鑒人類已有的文明成果），發揚自由民主，反對專制獨裁。因此，顧準沉痛地告訴人們：「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顧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闡述了他的這一思想轉變，「我對斯巴達體系懷有複雜矛盾的感情。平等主義、鬥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我親身經歷過這樣的生活，我深深體會，這是艱難環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籍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

顧準如是說：「不許一個政治集團在其執政期間變成皇帝及其宮廷。」

顧準如是說：「我還是討厭大一統的迷信。至於把獨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

顧準如是說：「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

「我憎恨所有的神。」普羅米修士在希臘神話中說。

「我憎恨所有的神。」顧準在殘酷的現實中重複，恍如千年空穀的一個回聲。

六

真理是殘酷的。真理穿透個人而把許多貌似堅固的信念摧毀了，任何思想的誕生，必然伴隨著懷疑、困惑、感悟，瞻望的躁動與訣別的痛苦，伴隨著舊日的挽歌。

那麼後期的顧準是否放棄了當初的信仰呢，許紀霖在評價與顧準同時代並且有著相同革命經歷的另外一位思想先驅李慎之時，有這麼一段話，同樣可以看著是對顧準的評價。

「我們要記住的，在所有其他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個共產黨人。共產黨人，意味著甚麼？每當我聽到一些學生，發誓要在畢業之前，像考一張劍橋證書那樣，解決『入黨問題』的時候，我就為共產黨被逐利之徒侵蝕而感歎。黨世俗化了，世俗得失去了理想。而當年李慎之們加入共產黨的時候，注入的不是功名利祿，而是一腔豪情。從『五四』第一代老共產黨人，到『一二九』運動出身的青年幹部，其實都是一批充滿士大夫精神的理想主義者，是他們撐起了這個黨的魅力和光芒。李慎之在懷念匡亞明先生的時候說：

我一向以為中國共產黨所以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除了客觀環境與政治路線的原因不說，有一點是因為老一輩的共產黨人大多是頂天立地的漢子。他們的骨子裏都秉承著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他們懷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抱負；『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的襟懷；『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氣節；立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樣，才能使他們前仆後繼，再接再厲，不達目的，決不休止。

李慎之就是這樣的共產黨人，即使後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他也不悔初衷。1998年，我出差北京，到他府上拜訪。我們談到了革命，談到了年青時代的選擇，我問他：『假如時光倒退六十年，您還會堅持您原來的選擇嗎？』他垂下目光沉思片刻，聲音低沉地回答：『當時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們要抗日，國民黨不抗日，共產黨要抗日；我們要民主，國民黨搞專制，共產黨反專制。我們是帶著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產黨的。只要你當年內心還有一點熱血，一點良知，你就不會選擇走另一條路。』

是的，當年的寶塔山下，黃河之濱，雲集的是像李慎之這樣的中華民族最優秀的青年，是那一代士大夫中的熱血精英。他們為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而來，充滿著崇高的獻身精神和烈士情懷。李慎之將這些共產黨人稱為『老派共產黨員』，一生恨愛，統統融化於間，他們對黨之榮辱、理想之執著，難以為後人所理喻。那是用青春的熱血和一生的苦戀所凝聚起來的情感，是容不得任何人去褻瀆和顛覆的。削肉還母，剔骨還父，是何等的刻骨銘心！」¹²

顧準至死骨子裏都是一位老派的共產黨人，從膜拜教義到發現馬克思播下的「龍種」，實際就是「一切人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這麼一個簡單的真理，為此，他燃盡了自己的生命。

參考文獻

羅銀勝：《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註釋

- 1 蔡軼倫：〈回憶上海中華職業學校〉，載上海文史選輯第59輯《解放前上海的學校》。
- 2 陳敏之：〈一件往事的追憶——紀念顧準逝世二十周年〉，《上海會計》，1995年第6期，第3頁。
- 3 羅銀勝：《顧準——民主與「終極目的」》，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84頁。
- 4 同註3，第93頁。
- 5 陳修良：〈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顧準〉，《上海灘》，1994年第6期。

- 6 《顧準日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9、20頁。
- 7 刑小群：〈我與顧準的交往——吳敬璉訪談錄〉，《百年潮》，1997年第4期。
- 8 同註7。
- 9 《顧準日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77頁。
- 10 同註9，第166頁。
- 11 《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8頁。
- 12 許紀霖：〈最後的士大夫 最後的豪傑〉，《二十一世紀》，2004年4月號。

周鐵水 上海立信會計學院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八期 2006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八期（2006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